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论慧能禅学思想的经济伦理价值=Economic Ethical Value of Huineng's Zen Thought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Book chapter
Authors	黄, 云明;Huang, Yunming
Publisher	全球伦理网
Rights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CC-BY-NC-ND 2.5; se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2.5/legalcode)
Download date	2026-06-23 16:02:52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56928

ECONOMIC ETHICAL VALUE OF HUINENG'S ZEN THOUGHT

Huang Yunming

Abstract: German thinker Max Weber thought that protestant Christian faith had removed obstacles of val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ics and provided spiritual power. Huineng's thoughts of Zenbuddhism, including "Buddhism existing in the earthly world", "Meditation can't become Buddha", "Understand the mind and see the disposition", etc. share great homogeneity with those of Luther and Calvin. He endowed secular activities with religious values, broke the spiritual bondage of secular activities and initiated a rational lifestyle. As a result, Huineng's thoughts of Zenbuddhism becomes the forerunner of Chinese modern enlightenment culture.

Key words: Huineng; Religious revolution; Zen; Economic ethics

Huang Yunming

Professor, College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P. R. China.

第 19 章

论慧能禅学思想的经济伦理价值

黄云明

[内容提要]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经过马丁·路德和让·加尔文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信仰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扫清了伦理价值观的障碍，提供了精神动力。慧能禅学的“佛法在世间”、“打坐不能成佛”、“明心见性”等诸多思想与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具有同构型，具有赋予世俗活动以宗教价值、打破世俗活动的精神禁锢、倡导理性生活方式的意义，是中国近代启蒙文化的先导。

关键词：慧能；宗教革命；禅；经济伦理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断言，西方基督教之所以能够率先创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推动社会现代化，是因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领导了基督教的革命，基督教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社会尽管有一系列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但是，由于中国宗教没有像基督教新教的改革，所以，不能提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价值观。全面审视中国儒、释、道三家唐、宋以后的思想发展，我们不难看出韦伯思想的偏颇。钱穆先生在《再论禅宗与理学》中说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相当于中国的马丁·路德，余英时在《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也肯定了此说。可见，理清慧能禅学思想及其经济伦理价值，对于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想进程意义重大。

19.1 宗教革命及其现代经济伦理价值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伟大的事业背后都有一个指导其进行的价值观念体系，他把这一价值观念体系称为“世界图像”。马克斯·韦伯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³¹⁹ 宗教伦理是构成这个“世界图像”的主要色素，宗教伦理的变革总是社会革命的先导。在西方社会，正是路德和加尔文领导的基督教新教改革，转变了人们对世俗活动的态度，赋予了世俗劳动以神圣的价值，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所需的价值观念，推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³¹⁹ [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7页。

韦伯认为，路德批评了天主教对待世俗活动的态度，“路德认为，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与此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现。”³²⁰ 他对世俗活动价值的评价逐渐提高，后来，路德不仅反对天主教贬低世俗活动的价值，而且主张赋予世俗活动以一定的宗教价值。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的时候赋予了职业以“天职”的思想，随着新教的传播，天职的思想也被新教的信仰者迅速接受。“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物的义务进行评价。”³²¹ 天职的思想赋予了世俗的日常活动以宗教的意义，“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的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³²²

托尼也认为，路德和加尔文的称义理论特别是加尔文的称义理论，彻底否定了善行和称义之间的联系，否定了教会和宗教礼仪的意义，认为基督徒有《圣经》和他自己的良知的指引就足够了，在某种意义上，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的区别已经消失，隐修生活被世俗化了；从此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处于相同的地位，这一进展包含了此后一切革命的萌芽，它是如此巨大，以致其余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韦伯认为，基督教新教确立了一种个人主义自我生存状态。因为预定称义论强调，人类只有一部分能够得救，其余则被罚入地狱，

³²⁰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59页。

³²¹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59页。

³²²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59页。

而哪些人会得救，哪些人下地狱，是上帝早已经预先决定的，“教士无法帮助他，因为上帝的选民只能用自己的心灵来理解上帝的旨喻；圣事无法帮助他，因为尽管上帝规定用圣事增添自己的荣耀，因而人们必须严格地执行，但圣事并非获得恩宠的手段，而只是信仰的主观的‘外在支柱’；教会也无法帮助他，因为尽管人们相信‘离群者乃不健康之人’，意即，回避真正教会的人永不可能是上帝的选民，然而取得外在性的教会成员的资格也仍然要接受末日的审判。他们应该属于教会并遵守教规，但不能以此得救，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他们也被迫遵守上帝的戒规；最后，甚至上帝也无法帮助他，因为耶稣也只是为了上帝的选民而死的。”³²³ 每一个信仰者的命运除了和上帝预先的安排相关，与任何其他事情都无关，每一个信仰者都必须孤独地承受自己的命运，忍受自己是不是上帝选民带来的心理孤独和焦虑，只有个人虔诚的信仰能够帮助自己减缓这种心理的孤独和焦虑。这种孤独感成为有幻灭感及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而这种个人主义，即使在今天也可以从有清教历史的民族的民族性格或习俗中发现，这与后来启蒙运动看待世人的眼光形成鲜明的对比。”³²⁴ 个人主义为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与民主政治的政治制度奠定了社会基础。

韦伯认为，基督教新教确立了理性主义的生活方式。预定称义论本身就是理性逻辑的产物，韦伯认为加尔文的逻辑是：“如果假定人类的善行或罪恶在决定这一命运时会起作用，则无异于认为上帝的绝对自由的决定能够受人类的支配；而上帝的决定又是永恒地固定了的，因此，这是于理不通的自相矛盾。《新约》中所描述的那个天界里的圣父，是那样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他会为一个罪人

³²³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79页。

³²⁴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80页。

的幡然悔悟而由衷地感到欣慰，恰如一个妇人为银币的失而复得而欣喜一样。但这个上帝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超验的存在，是人类理解力所无法企及的存在。”³²⁵ 所以，对于加尔文宗来说，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是为了上帝。人是不是能够得救完全取决于上帝，教会、神职人员、宗教仪式以及人的一切努力等都没有意义，一切与神秘主义相关的魔力性的东西必须从世界上排除，这是预定称义论的必然逻辑结论，加尔文宗的信仰者只能过一种绝对理性化的生活。“真正的清教徒甚至在坟墓前也拒绝举行宗教仪式，埋葬至亲好友时也免去挽歌及其它仪式，以便杜绝迷信、杜绝靠魔法的力量或行圣事的力量来赢得拯救这种想法。”³²⁶ 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特点。

预定称义论所昭示的上帝的绝对超验性，不仅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而且它宣称“一切和肉体有关的都是堕落”，于是，加尔文教的信仰者就必须把一切诉诸感官和情感的成分都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人们往往认为，基督教新教的改革是基督教信仰的弱化、世俗化，也许这确实是基督教新教的改革长期影响社会以后的结果，但是，在改革之初，加尔文不是让所有神职人员都世俗化，恰恰相反，加尔文让世俗生活中的所有人都要变成圣僧，加尔文信仰者的生活状态比天主教信仰者更具有禁欲主义色彩，更强调理性对本能、欲望、情感的约束和控制。新教徒的禁欲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资本积累提供开源节流的双向管道。

³²⁵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78页。

³²⁶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79-80页。

19.2 慧能的宗教经济伦理思想

韦伯在断言基督教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的同时，断言其他民族的市场经济文化之所以都是次生性的，是因为其他民族的宗教没有像基督教新教一样的改革，其民族文化缺乏现代化的内在基因。实际上，慧能禅学在诸多方面与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具有同构型，内涵了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文化因素。

19.2.1 佛法在世间与世俗生活宗教价值的确立

宗教经济伦理变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消除传统宗教圣俗两分的绝对界限，摆脱贬低世俗活动的价值观念，解除世俗经济活动的传统伦理束缚。基督教新教的改革要点之一就是世俗活动价值认识的转变。

传统佛教将世界分为尘世和净土，认为世俗世界是尘世、秽土、苦海或者火宅，修行佛教的目的就是要往生西天佛国净土世界。慧能一反传统佛教的思想，主张成佛就在当下、此世。他说：“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³²⁷ 慧能弥合了圣俗、僧俗的绝对界限，他认为佛教修行不一定在寺院、真心修行在家也可以。

宗教经济伦理变革不仅要摆脱贬低世俗活动的价值观念，解除世俗经济活动的传统伦理束缚，还要更进一步赋予世俗活动以宗教的神圣价值，才能做到将宗教伦理价值转化为世俗活动的精神动力。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认为人的行为与其能否得救无关，人在现世生活的唯一目的应该是荣耀上帝，世俗的成功是荣耀上帝的根本方式，世俗活动因此获得了神圣的价值。

³²⁷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35页。

慧能说：“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³²⁸ 慧能认为，佛国净土和现世秽土的差别不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心净、心善就是佛国，在现世依善心而行，就是佛行，就是修行，慧能赋予了现世活动以宗教的价值。

当然，慧能的本意与经济伦理几乎是风马牛。但是，禅宗僧人对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具有了相当明确的经济伦理价值。宋代禅师大慧宗杲将慧能的佛法在世间表述为“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世俗的宗教价值更加明确。百丈怀海则以此为价值指导确立了禅宗的“普请”制度，重新制定了禅宗僧人的生活戒律，规定禅宗僧人“朝参夕聚，饮食随宜，示节俭也。行普请法，示上下均力也”。³²⁹ 这种普请制度规定僧人必须过节俭的生活，大家一起睡通铺，一起劳动，一天不劳动，一天不吃饭。百丈怀海禅师率先垂范，“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波寰宇。”³³⁰ 佛祖最初为佛教僧人确立的是托钵乞讨的生活方式，修行就是要摆脱世俗活动的纷扰，而普请制度却将劳动作为修行不可或缺的功课。后来的禅僧逐渐将修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强调修行不能脱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可以修行。唐朝著名的居士庞蕴作偈云：“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北山绝点尘。

³²⁸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36页。

³²⁹ 梁·释慧皎等：《高僧传合集·宋高僧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45页。

³³⁰ （宋）释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第136页。

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³³¹ 大珠慧海禅师说修道用功就是“饥来吃饭，困来即眠”。³³² 历代的祖师大德，出身行单的很多，雪峰在德山座下当饭头，道匡在招庆座下任桶头，绍远在石门座下任田头，晓聪在云居座下任灯头，义怀在翠峰座下任水头，香岩刈除草木，云岩帮人补鞋、作鞋，临济锄地栽松，仰山开荒牧牛，洞山锄茶园，玄沙砍柴，赵州扫地，印光行堂，诸多大德莫不是在劳动中领悟禅的滋味，成为一代龙象。当然，禅僧将修行与日常生活融合，目的不在圣化日常生活，而是将修行普遍化，但是，既然融合，圣俗的界限就被打通，赋予世俗生活以神圣价值已经是题中应有之义。

佛法在世间的思想对日本佛教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著名学者山本七平在《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日本高僧铃木正三在禅宗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即禅行”的思想，实现了日本佛教的世俗化，促使日本佛教徒确立了现代生活发展所需要的价值观，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提供了敬业的精神基础。铃木正三主张，“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人人各守其业即可成佛，而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必信其所事之业皆于世界有所益。……世无铁匠以下诸工匠，则无诸品可用；世无武士，则无以治国，世无农人，则无谷粟充饥；世无商人，则无货物流通。此外尚有诸多职业，亦皆于世界有所益。”³³³

近代社会以后，太虚、虚云等大和尚以及赵朴初先生，发扬禅宗思想精神，倡导实践佛陀教导、利济众生的人间佛教，主张佛教不是消极地避世，而是积极地救世；不是空虚玄谈，而是真笃实践；不是追求作神做鬼，而是利用佛教思想改造现实社会，推进社会进

³³¹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八《襄州居士庞蕴》。

³³² (宋)释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第157页。

³³³ 转引自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5年，第117页。

步，促使众生觉悟人生。“生活禅”是沿着这条道路创造的更切合现代生活特色佛教形式。

19.2.2 明心见性与个性自由和解放

精神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基督教新教改革倡导因信称义，主张信徒凭着信仰就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每一个信徒自己都可以祈祷和忏悔，可以通过《圣经》获得神意，打破了天主教宗教组织的神学权威，废除了天主教神职人员对神权的垄断，为信徒的精神解放创造了空间。在天主教中，神职人员垄断着《圣经》的解释权，《圣经》只有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了便于信徒阅读《圣经》，路德倡导各民族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圣经》。

慧能创立禅宗同样具有打破传束缚的佛教革命意义。慧能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据《坛经》记载：

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獠獠，若为堪作佛？”

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³³⁴

慧能强调人人皆有佛性，将终生成佛的依据内在化，与基督教新教的称义依据内在化具有同构型。

人人皆可成佛，不是说人人就是佛。佛和众生的区别是迷和悟。慧能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³³⁵ 他还说：“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

³³⁴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24页。

³³⁵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37页。

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³³⁶ “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本性？”³³⁷

既然自性的迷悟是成佛的关键，所以，佛教修行的根本就是剥除内心自性的尘垢，而不必拘泥于读经、念佛、打坐等传统的修行方法，所以，慧能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据《坛经》记载：

尼乃执卷问字，

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

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

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³³⁸

慧能主张不立文字，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并不是说佛经没有价值，而是说不要拘泥佛经，如果拘泥佛经，还不如不读经。慧能说：“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方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³³⁹

单从外在形式上来看，慧能对待经典的态度与路德截然不同，一个是打破经典权威，一个是确立经典权威，但是，二者要打破传统宗教束缚的根本价值追求是相同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在冲破传统教义束缚，追求精神解放上，慧能更彻底、更坚决。

³³⁶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31页。

³³⁷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33页。

³³⁸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44-345页。

³³⁹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33页。

佛、法、僧是佛教三宝，皈依佛教就要皈依佛、法、僧。慧能禅学革命，将传统皈依佛、法、僧改为皈依自心三宝，“若言归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却成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³⁴⁰由此可见，慧能和路德都重视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的作用，但是反对把它们绝对化、权威化。

慧能的后人与慧能相比，走得更远，他们不仅不再强调佛、僧和经的重要性，而且为了追求心灵的自由，贬低佛、僧和经的重要性，甚至于呵佛骂祖，说佛经是拭疮疮纸，德山宣鉴骂禅宗祖师：“达摩是老臊胡！”出于同样的道理，义玄禅师，还骂出了更利害的话，认为求法之人，真要想获得佛法见解，就一定不要受人从外欺惑，逢着就要把它们杀掉，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只有不被任何一物所拘束，心灵才能够真正自由自在。

既然明心见性是成佛要旨，传统佛教的修行，诸如：念经、参禅、打坐、持戒……都不必拘泥。所以就有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有的僧人不仅喝酒吃肉，甚至嫖娼狎妓，简直是视清规戒律为无物，百无禁忌了。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要求其主体个体人格的独立以及个性的自由和解放。禅宗僧人的精神解放是为了追求心灵的自由和幸福，没有世俗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但是其产生以唐宋市民社会的发展为背景，也促进了中国人的个性的自由解放，对于明清之际的社会启蒙具有深远的影响。

³⁴⁰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42页。

19.2.3 打坐不能成佛与理性生活方式

韦伯将人类现有宗教分为两种：禁欲主义宗教和神秘主义宗教，他说：“宗教信仰者既可以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圣灵的容器也可以因为觉得自己是神的意愿的工具而确信自己已处于恩宠状态。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的宗教生活倾向于神秘主义和感情主义，而在后一种情形里则倾向于禁欲行为。”³⁴¹ 在韦伯看来，西方宗教倾向于禁欲主义宗教，东方宗教则倾向于神秘主义宗教，基督教新教是最典型的禁欲主义宗教，而佛教、印度教和中国道教等则是典型的神秘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宗教往往与信念伦理相关，禁欲主义宗教则往往是与责任伦理相连，与神秘主义宗教相比，禁欲主义宗教更具有理性主义精神，更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与西方基督教相比，佛教具有更浓郁的神秘主义宗教色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佛教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隋唐以后，慧能禅宗对佛教的改革，使佛教具有了更多的理性主义精神，这种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成佛状态认识的转变；其二是佛教修行方法的转变。

首先，禅宗将佛教的彼岸追求现实化，强调佛法在世间，在现世当下也可以成佛，而且禅宗的信仰者强调成佛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就是搬柴运水、穿衣吃饭，并不神秘。《坛经》记载：

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

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

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

³⁴¹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86-87页。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³⁴²

成佛就是觉悟人生，能够顺其自然地接受生活的实有状态。

其次，修行的根本在于明心见性，所以参禅、打坐等就不是关键。《坛经》记载：

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

惠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

谓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³⁴³

简化圣礼以及减少圣礼的宗教价值是基督教新教对天主教改革的重要表现之一。天主教认为，洗礼、圣餐礼、坚振礼、告解礼、终傅礼，圣秩礼，婚礼等七件都是圣礼。基督教新教改革后只承认洗礼和圣餐礼为圣礼，尤其是清教信仰者几乎反对所有的宗教仪式，认为所有宗教仪式都有神秘主义倾向。

佛教的禅定是典型的神秘主义的宗教仪式，禅定是佛教徒追求与佛际遇的根本方式，也是获得神机妙用的基本途径。慧能创立禅宗就不主张强调参禅打坐，《坛经》记载：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³⁴²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59页。

³⁴³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29页。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³⁴⁴

慧能的后学更有人明确反对参禅打坐。《五灯会元》载，“开元中有一沙门道一，即马祖耶。在衡岳山常习坐禅。师（南怀岳让）知是法器，往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一曰：‘图作佛。’师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什么？’师曰：‘磨作镜。’一曰：‘磨砖岂得成镜耶？’师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作佛？’”³⁴⁵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将修行融汇在日用常行，而不是追求玄虚的参禅打坐，生活方式的理性色彩强化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禅僧的目的是修炼成佛，但是，生活方式的理性因素的增加可以间接地影响社会，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19.3 慧能宗教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地位

从慧能的禅学思想确实还很难看出促进世俗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伦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在理论内容、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导向等多方面影响了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赖永海说“阳明之学，实多以儒家术语、范畴去阐发禅学的佛性、心性理论，是儒学其表，禅学其里。”³⁴⁶ 王阳明的基本哲学观念“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与慧能“心具万法”“人人皆有佛性”“明心见性”等密切相关。特别是王阳明在慧能“佛法在世间”和“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的思想基础上提出，只要是本着善心而行，就是善行，在世俗社会中，不论做什么，只要是践履内在的良知就是圣贤的行为，因此，他反对传统儒家士农工商四民贵贱不同的等级思想，主张：“古者四民

³⁴⁴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37-338页。

³⁴⁵ （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第127页。

³⁴⁶ 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5页。

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其尽心。其归要在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³⁴⁷

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王阳明《传习录拾遗》中还说：“虽经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在王阳明的影响下，明末诸多学者都对传统儒家的崇本抑末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安以文物着。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闾儒？，则其躬行彰彰矣！”³⁴⁸

“四民异业而同道”“商与士异术而同心”的“新四民论”解除了商人从业的传统道德价值的束缚，“虽经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甚至可以说为商人的敬业精神提供了价值观的支持。

慧能的宗教经济伦理思想没有像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那样催生出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花朵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国唐宋以至明清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是社会客观原因。

唐朝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与周边各国贸易往来、文化交流频繁，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佛教在这个时期获得迅速发展，世俗文化也获得长足的进步，慧能禅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宋朝以后，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世俗社会市民文化进一步发展，沈垚在《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中说：“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权利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贍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显通。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

³⁴⁷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91页。

³⁴⁸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5，黄山书社，2004年，第1146页。

世商人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³⁴⁹ 宋朝，隋唐佛教八大宗中惟禅宗一支独秀，不仅是因为禅宗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适合中国人的内在心理，更是因为禅宗思想契合市民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元朝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这也是禅宗开始式微的社会原因。明朝以后，人口剧增，科举名额没有与人口相应增加，“弃儒就贾”成为儒生不得已的选择，市民社会因此获得进一步发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³⁵⁰ 明末“弃儒就贾”的社会运动以财富开拓了民间社会，为儒家的社会活动提供了新的社会条件，同时，专制皇权恶化造成的政治僵局又堵塞了儒家凭借朝廷改革政治的传统途径，两个方面一迎一拒，导致了儒学转向。满清入关，中国市民社会的进程再次受阻，尽管清朝沿袭了明朝的社会管理制度，但是它维护的必然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必然会对改造传统思想的启蒙文化进行打击，如果没有元朝和清朝对市民社会的阻断，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像韦伯断言的不可能。毛泽东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³⁵¹ 是有道理的。

其次，禅宗文化自身特殊性是内在原因。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世界主要宗教的先知有伦理先知和楷模先知两种类型。伦理先知有将上帝旨意布达给民众的使命，他们提出一整套的预言，并由此衍发出系统的教规、教义和伦理规范，对人们世俗生活的控制深入而全面；楷模先知凭借个人的美德善行来教育人，预言缺乏系统性，不能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全部容纳在宗教伦理的约束范围之内。慧能是典型的楷模先知，而路德则是伦

³⁴⁹ (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24。

³⁵⁰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第251页。

³⁵¹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84页。

理先知。佛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更没有像基督教那样的垄断地位，路德改革影响注定是全社会的，而慧能的影响注定是局限于社会一隅。儒家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佛教影响社会往往通过影响儒家来实现，慧能思想影响世俗社会也是以儒家为中介的。

韦伯把世界宗教的救赎方式区分为入世主义和出世主义两种，认为入世主义宗教本质上与禁欲主义宗教相连，出世主义宗教则与神秘主义宗教相通。入世主义宗教与出世主义宗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直接、广泛而深入。基督教新教是典型的入世禁欲主义宗教，而佛教则是典型的出世神秘主义宗教。佛教禅宗改革入世主义倾向明显增加，但是佛教出世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路德的宗教思想融汇着系统的社会法律思想，而且路德的法学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样的情形，对慧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韦伯把世界宗教区分为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两种，认为禁欲主义宗教更具有理性主义精神，神秘主义宗教具有情感主义倾向。佛教禅宗改革理性主义追求增加了，但是佛教神秘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慧能思想与路德思想相比显然理性化程度不够。禅宗僧人虽然强调成佛可以在现世当下、在日用常行中，但是也强调成佛的觉悟境界是如哑受义、不可言说、“一落唇吻即不是”的神秘境界。

基督教新教之所以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因为新教信仰特别是加尔文的预定称义论给信仰者造成了强烈的内在心里张力，使信仰者时时刻刻处于是否是上帝选民的焦虑，为他们的职业活动提供了精神动力。慧能禅宗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脱人生苦难，追求内在心灵的和谐宁静、幸福和安逸，所以，禅宗信仰给信仰者心理的影响与加尔文教截然不同。

研究慧能的思想以及将其与路德和加尔文比较，目的不在于说明西方社会的东西，我们的祖先早已就有，而是通过比较研究促使

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盘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利于推进现代化的进程。

本文中第二部分原载于韩国学术杂志《东洋礼学》2014 年第 10 期